

琴心

■ 孟红娟

——
残阳从宽阔的江面上褪去，渐渐隐入对岸的丛林。在江边守了一天的钓翁已收竿回家。天色已暗，山上的杜鹃独自在暮色中灿烂。七里滩的潮水已退，江水汨汨，缓缓而淌。不知何时，一弯淡月在宽阔的江面上升起。月色清幽，静静地照拂着睦州的山川民居。这是一个江清月静的夜晚，三山塔上的钟声铛铛地响了数下。

宋景佑元年（1034年）的一个春夜，睦州郡所内，烛火通明。46岁的新任知州范仲淹命厨房略备酒菜，邀请了几位幕僚好友与僧人来公署小聚。几杯薄酒下肚，诸人心情畅快，一致邀请范仲淹抚琴助兴。

此次虽被贬睦州，但范仲淹一路行来，心情随着景色不断变化，舟行陆替，行程中留下不少诗作，尤其是睦州清丽的山水，激发了他疲惫已久的心。酒助雅兴，范仲淹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走到琴桌前，抬头望了望窗外的明月，月儿如勾，月色清幽，时不时有淡淡的片云飘过。看着迷人的夜色，范仲淹微熏的脸色泛着红光。仆从在琴旁点了一支细香，轻烟袅袅，范仲淹定神回忆了白天去探访过的严子陵钓台，然后端正身姿，调整心绪与呼吸，对准徽位，弹起他一生中最爱的曲子《履霜操》。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这样的有趣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履霜》曲音，忧伤却坚定。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右司谏。当时仁宗与郭皇后不和，偏听偏信，决定废后。事实上郭皇后是一位正直而有见地的女子。范仲淹认为“郭后无故不可废”，结果被仁宗皇帝一纸诏书，贬到睦州，这是范仲淹人生中的第二次被贬。

睦州别称桐庐郡，位于浙江（即钱塘江、富春江）的上游和新安江的下游，辖区包括当时的淳安、遂安、建德、寿昌、桐庐和分水六县，辖境相当于如今的建德市、桐庐县和淳安县，州治曾设于桐庐，后迁在建德市梅城。

景佑元年（1034年）正月，范仲淹带领家眷离开汴京，其间经过颍河、淮河、钱塘江和富春江。那天，他们的船正行淮河上，遭遇狂风大雨，波浪翻滚，差点把船掀翻，坐在船上的妻儿吓得纷纷抱怨行程艰难。面对妻儿的埋怨，范仲淹自信地认为自己对国家一片忠诚，不会像屈大夫那样有葬身汨罗的下场。想到这段惊险的经历，他写下了《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表达了他对在旅途中遇见风险，其实也是他人生仕途上风波迭起的反映。在各种凶险的波浪和风险面前，范仲淹始终以积极豁达的心态面对，“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折射出他关爱别人，拯救他人的品行和风范。

四月中旬的江南，春意正浓，杨柳依依，草木清新，花含笑，水润媚。范仲淹经过三个多月和三千多里水路的长途跋涉，终于疲惫地到了令他向往已久的严陵之地。

睦州一带，虽然山多地薄，人口稀少，但自然风光似诗如画，孕育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还诞生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之“睦州诗派”，仅唐朝就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等大诗人。这里的山水和人文，都是他心里仰慕的。

赴任之初，他心中郁积着诸多不解和愁怀，心想自己忠心相谏，却被奸臣所阻。然而一路行来，尤其是到了富春江严陵胜境，所有被贬的不快和郁结都被这里的明山秀水一一化解了。于是，到桐庐郡后他便以乐观的心态一气呵成写下了《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这里的江山云水，这里的沧浪溪水，这里的鲈鱼白鸟，都让人素心悠然、怡身养病。这十绝，是他在桐庐郡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的真实写照，他庆幸自己与这一方水土有缘。因而，到任不久，便给恩师晏殊写了一封信，信中描写了桐庐郡的自然奇胜，以及他在桐庐郡与幕僚章叟、阮逸和僧人、野客等写诗弹琴、乐而忘形的生活状态。书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饱满的情感，逸兴高远，丝毫不在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之下。

“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谁相和，寥寥鹤在阴”（《斋中偶书》）。研《易经》，操古琴，是范仲淹的两大终身爱好。无论在桐庐郡还是其他地方，这两大爱好始终跟他不离不弃。

这晚，月夜下饮酒弹琴的雅兴，正是《与晏殊书》和《斋中偶书》诗的生动还原。

收回那野马般跑远的思绪，范仲淹将目光聚焦在古琴上，又弹了一遍《履霜操》，轻灵的琴音仿佛严陵溪的潺潺清流和冷冷春水；上行下行，灵活的走手音恰似严子陵的高风。有人评价范仲淹，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又以《履霜》一曲尽得千年风雅。

在桐庐郡任职期间，范仲淹除了公务修建严子陵祠堂、做泽惠乡民的好事，在公暇时间赋诗弹琴外，还游览乌龙山，探访方干故里。他以这里的山水为对象，写了气势非凡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十首诗的首首都以“潇洒桐庐郡”开头，春茶、画楼、隐泉、清潭、莲花……这里的“神仙境”，充分陶冶了范仲淹的性情，桐庐更因范仲淹有了一个响亮的前缀词“潇洒”。

诗言志，琴言心，潇洒桐庐郡，使范仲淹这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诗兴大发，也令他琴意更浓。

二

夜已深，诸人尽兴而归。

清澈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范仲淹的卧室，落在他的枕边。范仲淹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今晚的琴酒雅兴，让他兴奋得失眠了，想到从汴京来桐庐郡的日日夜夜，尽管时间不长，但这里的山水和人文足以让他频频咀嚼。哼着《履霜操》的旋律，就着清亮的月色，他轻轻打开青壮年时代爱琴、学琴、赏琴的记忆之门。吱呀一声，两扇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范仲淹两岁，父亲范雍因病去世。他们孤儿寡母，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只得带着他再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家，取名朱说，直到他人仕后29岁那年，才奉母命还范姓，改回姓名。

二十岁那年，范仲淹曾远游陕西，结识了鄂县（今河南睢县西北）名士王镐。

“王镐善琴，其清而贤，隐而未出。平日里裹白衣、跨白驴，枕琴籍书，纵饮浩歌，优游云泉，有嵇阮之风。”他欣赏、羡慕王镐袭白衣、跨白驴的魏晋风度，并因王镐结识了河南汝南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浙江临海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但都爱好和精于古琴。那段时间，他们朝暮相处，弹琴弦歌，生活虽苦，但因为有琴，精神却无比自由快慰。

一天，范仲淹住在王镐的别墅中。那晚，夜色朦胧，万籁俱静，月儿高悬，云意悠闲，翠色万迭。他突然听到悠扬的笛声从西南方向依然而起，声音盖满了整个林壑。当时，只觉得天地人等万物浑然在一片冰壶之中，这让他惊异万分。一同赏月的王镐告诉他说：“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凡四十年矣！”范仲淹不由感叹：“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这才是真正的隐士之乐啊，他惊羨老者的超然于物外。

对这晚的印象之深，甚至当他57岁时，仍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和王镐、周德宝、屈元应等琴友的来往。他在《鄂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写道：“相与啸傲于鄂、杜（今陕西西安南部）之间，开樽鸣琴，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青少年那段诗琴弦歌的时光，这段与王镐的相识，并与道士交游的经历，深深影响着他的一生。他一生爱琴，自称“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得益于跟他们的交往。

二十一岁时的范仲淹，在长山附近的醴泉寺读书。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刻苦不能有成，每天只煮一盘粥，凝结后分成四块，早晚拿两块粥冻，夹着几根切碎的咸菜，点盐吃，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近三年。他的《荠蔬》诗流露了独特的志趣：“陶家翁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口中，嚼生宫商角徵”。对范仲淹来说，无论走到哪里，茶饮可以不思，但琴剑必须随身。他在《和杨旼孤琴咏》里表达了对琴的喜爱：“爱此千里器，如见古人面。欲弹换朱丝，明月当秋汉，我愿宫商弦，相应声无间。自然召南风，莫起孤琴叹。”或许，琴是他与天地沟通的最好方式。

两年后，他到南京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应天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藏书数千卷。这里的学习环境令范仲淹如鱼得水，不思昼夜。五年的刻苦攻读，终于列榜。其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诗书琴画相伴，却乐在其中：“白云无轮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鸛鹤。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这是他丁母忧期间，应恩师晏殊之请，执掌应天书院时写给晏殊的诗。诗句连用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伯牙巧遇知音钟子期、左思赋诗山苗荫涧松等典故，来表达他贫贱益奋不移安邦之愿、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胸怀，他以颜回那种直面人生、笑对苦难的精神鼓励自己。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四十岁时，在晏殊的推荐下，荣升为秘阁校理，负责宫廷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期间，他有机会与馆阁文臣、当朝琴艺第一的宫廷乐师崔遵度结识，并师从崔遵度学琴。

学琴期间，他曾向崔遵度请教，如何弹出感人至深的曲子。崔遵度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崔遵度的这一回答，成为日后决定中国琴风的千古名言，清雅和润、静远飘逸，定下了中国古琴的基本风格。至明末清初，江苏常熟有虞山派出，扶汉唐以来中华琴学之精微，倡导“轻微淡远”之旨，崇雅黜俗，凡琴上取躁急之声、有重浊之情者，不合淡远之旨、无有轻微之意，便不合雅正之道，非古琴之“正音”。就此而言，筝笛琵琶之高亢、嘹亮、急促和华丽，与清虚旷远、淡中有味的古琴音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思虑，范仲淹终于理解了“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这也正是他的琴道观。

北宋琴家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是范仲淹的高足。任过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的朱长文，对范仲淹特别敬慕，他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君子抚琴，在于中正平和，而非取悦他人，范仲淹虽然技艺一流，但弹奏的琴曲并不多，他对琴理的领悟非常深刻。

范仲淹一生只弹《履霜操》一曲，此曲足以抚慰他屡屡受伤而不屈的心灵。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呢？蔡邕《琴操》记载：《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伯奇被逐出家，清晨履霜，自伤无罪，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思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厄。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故事中的伯邦实可恶，伯奇令人同情。伯奇用琴声表达自己的心声。

魏晋大琴家嵇康在《养生论》中云：“抚琴若心自适，无弦亦可”。相传陶渊明不会弹琴，却要长年在家中放一把无弦琴，每逢酒酣意适，轻轻抚摸，无声胜有声，不失为灵魂的寄托。我以为，范仲淹弹《履霜操》也同此境，白天辛苦，人事复杂，静夜抚琴，点一炉檀香，于袅袅青烟中体味清虚旷远之境，身体得以暂歇，心灵得以超越。

严陵滩边月色皎，范公府内花含娇。因操缦《履霜》曲而失眠的范仲淹枕着月光，将青少年时代的成长道路及自己对琴的痴迷情怀梳理了一遍，逝去的一幕幕跟琴曲一样，沉静旷远，总是适时地荡漾在他内心深处。如今已是中年的范仲淹，有缘潇洒在桐庐郡的钓台、千峰、白云、清溪和沧浪里，对生命、国事和琴道又有了更深的感悟。

三

夜寂静，天光微明，范仲淹仍无睡意，他想起了自己

第一次遭贬的经历。那是他在任睦州知州前几年的天圣七年（1029年），由于上书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被贬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做通判，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波折。

忆起在陈州任地方官时，他曾在一个仲秋之夜听当地一位高僧真上人弹琴，并作诗《听真上人琴歌》。诗中，他以一个知音者和艺术家的手笔，声情并茂地描绘了真上人丰富多彩、优美传情的琴声：“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灵，十二街珠下仙鹤”。琴声在他内心掀起强烈的共鸣，不禁泪如雨下，“伏羲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诗中，他还从一个被贬之臣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的视角发出了“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见天下心”，富于哲理的感慨和呼喊，这声响亮的呼喊折射他心忧天下、爱民万物的政治家形象和海纳百川的胸怀，这无疑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在音乐思想领域的独见，难怪后人赞他不愧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伟大人。

有人读了《听真上人琴歌》，如此高度评价：“前有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后有范仲淹‘我闻遗音泪如雨’”。

据考证，古琴创制于虞舜时代的乐正夔，至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先秦文献即有古琴的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等。中国古琴，在汉魏就已经被作为一种“以琴载道”的道器，而逐步脱离了单纯供人们娱乐赏玩的乐器技艺。那日，范仲淹问崔遵度“琴何为是”，当崔遵度回答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观点，以及他《听真上人琴歌》发出的“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的呼喊，这些其实都是宋代琴人，对中国古琴音乐理论的自汉魏以来的发展和贡献。

回忆自己赏琴、爱琴、弹琴的一幕幕，范仲淹觉得自己更喜欢在琴曲中思古。他在《鸣琴》诗中写道：“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尧舜二帝是远古时期的圣人，他们的德行传世人尊敬。《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人用“鸣琴”称颂地方官简政清刑，无为而治。《鸣琴》诗恰恰反映了范仲淹崇古且追求中和之道的价值取向，事实上这正是他多年为政之道的心声。

宦海人生，风云多变，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于琴学理论，将音乐同治世之道、人生志趣联系在一起。他在《与唐处士书》中提出了“琴不以艺观”的思想。文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以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数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可见，他所推崇的是上古的、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他反对后世传作者的“妙指美声，巧以相尚”，反对把古琴当作“艺”来对待。他认为崔遵度琴艺最值得称道的是“清静平和、性与琴会”，只有琴与人合，人与音合，音与弦合，才能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

范仲淹所反对的这种琴艺，正是艺人琴，尤其是唐代以来的艺人琴。他的这个观念，影响极为深远，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在复述这个命题，坚持古琴不是乐器、琴乐也不是音乐的观点。

“自古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清·《五知斋琴谱》）

“琴这个东西，说它是音乐可以，说它不是音乐也可以。因为向来弹琴的人，就不肯把琴当做一种艺术。说它是合乎道性的，一个拿来修身理性、导养延年的。”（彭祉卿《从现代音乐上论琴》）
琴是载道之器，非音乐艺术范围的“乐器”所能局限；琴乐也非一般所谓的“音乐”，真正的琴乐，是并不追求旋律之优美，也不孜孜于节奏之合拍的。这在一千年前的范仲淹就已提出了。

一个心忧天下的政治家，何止于琴？

其实，范仲淹的琴乐理论与他的政治观点是同频共振的。他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他认为“治乐同治世，治乐尤治心”。他作诗“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其心灼灼。因而在他的为政生涯中，他总是不断上书朝廷，希望校正时弊，但是屡言屡贬。然而，无论仕途如何坎坷，他总能胸怀坦荡，自适自安，因为他知道曲高则和寡，他相信自己“此心良可歌”，希望与先辈，唐朝宰相范履冰那样，跟天地自然、古琴、以及像尧舜一样的有德之人引为知己。

不出其然，他在睦州待了不到半年，便改任苏州知州。第二年，因在苏州修建水利有功，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升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可是后来因《百官图》一事得罪了丞相，出为饶州（今江西鄱阳），那是他第三次遭贬。

四

生命就是一首悲欢交响曲。

这夜，失眠的范仲淹庆幸自己虽沉浮于宦海，但生命中总有一些知音伴随，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彼此相知相契，这足以填补生命中的缺憾和失意。他向来把与名士交游、与知己论道、与隐士唱和看做人生的乐事。他曾说过：“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躺在床上，他在心里默数着生命里的一个个琴中知音，除青少年时期交游的王镐、周德宝、屈元应这几位研道的琴友和恩师崔遵度及高僧真上人外，还有处士唐异和隐士林逋等人。

范仲淹曾问崔遵度，当朝还有谁与崔公志同道合，谁的琴艺可与他比拟。崔说非唐异处士莫属。范仲淹敬佩唐异的琴艺，更崇拜他“厌人市朝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的高洁。

枕着如水的月光，范仲淹继续回忆与唐异的交往。他曾写信给唐处士，期望得到唐异的传授。在《与唐处士书》中，范仲淹除了阐述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等琴理外，还慨叹秦以后琴道散失，而他所在的大宋“皇



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故谕德”，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而唐异也敬重范仲淹，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两人以文相通，以琴相友，最终结成了知交。

范仲淹交友有自己的准则，那就是“惟德是依，因心而友”。一个个人物从他眼前晃过，唐异是崔遵度推荐给他的知交，他还十分钦慕当朝隐士林逋。

林逋比范仲淹大二十一岁，后人称他和靖先生。林和靖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他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终生不仕不娶，只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林和靖还喜欢琴，《青莲舫琴雅》提道：“林和靖喜琴，每一鼓则二鹤起舞”。像鹤一样，据说梅花对古琴音乐之美也有相当敏锐的感受，古人说它“此花不独解语，更能知音”。林和靖有琴、鹤与梅相伴，他的隐逸生活，许多人心向往之。

天圣三年（1025年）前后，范仲淹曾怀着仰慕的心情给林逋寄赠过诗作。林逋回赠《送范寺丞》，诗中，林逋把范仲淹比喻为汉代的司马相如和位卑敢于进谏的“仙尉”梅福，流露出钦佩和期许。有了诗作往来后，在兴化任职的范仲淹便几次去杭州孤山，即便《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还要再去，当他再访林逋时，正值孤山天气放晴，草木葱茏，上岸后即见到“碧嶂深涧娇晚翠，白云舒卷看春晴”。从冗杂的宦海来到明净的孤山，范仲淹感到内心澄澈敞亮，仿佛“寻仙人翠屏”。那天，他们一起抚琴饮酒论诗赏鹤，纵谈古今，忘了身在何处。

我曾数次去孤山，红色的“孤山”两字，“孤”字少了一点。世人解释为孤山是西湖边的一个岛，是与白堤相连的半岛，白堤连通了孤山和三潭印月，在孤山上可以欣赏到西湖的美景，因而有孤山不孤之说。山上有座放鹤亭。亭内的对联上写着“水青石出鱼可数，人去山空鹤不归”，含义幽深，场景广阔。

想到与忘年交林逋在孤山上的交游，范仲淹的心从秀峰白云绕的桐庐郡一下子就飞到了百里外的西子湖畔。那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时光啊。

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在桐庐郡这无眠的一夜，使范仲淹对自己激扬的前半身和生命中的诸位知音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万千的思绪被桐庐郡的千山秀水荡涤得不想问“千钟”了。

其实，范仲淹的知交琴友中，还有后来的僧人音乐家日光大师。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由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仲淹经历了抗敌西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邓州三年后。这时，离他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已两年多时间。

范仲淹到杭州后，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僧人音乐家日光大师，还听了他的演奏。日光圆寂后，范仲淹践约为这位和尚作了一篇《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在“塔记”中，范仲淹称赞日光大师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是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风度。范仲淹的这篇“塔记”，实为借日光大师“清而弗衰，和而弗淫”的音乐进一步阐明自己“琴不以艺观”的音乐理论。

由此，想到我平时练琴，徽位总是拿捏不到位，尤其是十八、七九、七六、六二、五六等弦位，常有偏差，自然很难奏出山泉泠泠般的琴音，为此老师曾教我用西画的平面透视图来准确定位。可以想象，范仲淹平日操琴，肯定受过日光大师的影响，他弹《履霜》曲，厚重而不粗糙，轻灵而不虚飘，快速而不急促，迟缓而不松弛。同时，范仲淹这篇塔记本身，也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天竺琴歌”。

五

神思悠游，走出近千年前的范仲淹郡所，我走进桐庐县城的范仲淹纪念馆，我想寻找他的琴声。纪念馆背靠平阳山，面朝富春江中心广场，整个场馆被绿树包围，馆前粉色的睡莲清幽绽放。

馆内有范仲淹的生平介绍、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及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励志故事，有他的诗文及研究他的各种文集，还有自宋以来历朝名人、伟人对他的评价。宋朝理学家朱熹称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

四起四落，不改初心；倡导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使大西北得到长期稳固；发现并培育了大批青年学人，为宋代学术鼎盛建立了功勋；革新文坛，诸多诗词歌赋传颂至今。为官三十余载，范仲淹留下了众多的佳绩美谈，宋史赞为“一代名士之臣”。然而，颇为缺憾的是，没有范仲淹琴学理论的介绍。

其实，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范仲淹都有不同的感慨，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写进他的诗词中，也弹进他的乐曲中。记得国内一位神经学家这样概括音乐的作用：音乐留在脑中的印记，要比其他所有的人类经历都要深。这同样适用于古人，从这个层面说，范仲淹抚《履霜》，将他人生的时间长度与思想的空间广度大大拉长拓宽，琴就是他情感的最好宣泄。

对范仲淹来说，没有琴，人生与生活都是不完整的。富春山白云悠悠，富春江碧水长东，范文正公琴心可鉴，范履霜，琴心中饱含着的忧乐正时时洋溢。